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将军军管日记——七机部文革	杨国宇
【往事非烟】	鲤鱼洲纪事	龚人放
【劫后反思】	今天该如何反思文革？	马 勇
【不堪回首】	魂萦上海滩——文革中的那些邻居	木 桩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亲历者言】

将军军管日记——七机部文革

• 杨国宇 •

（日记写作者：杨国宇，1914年生于四川仪陇，2000年5月去世。1933年参加红军，1978年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早年随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浴血奋战，解放后曾受周恩来之命，与钱学森一起参与领导航天工业、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率领海军舰船参与远洋航行以完成重大军事科研和建立中国南极站等项任务。本文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 1967·3·22

国防科委通知：由我们二十三基地派出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到七机部第三研究院实施军管。晚上我们基地党委常委几个人讨论由谁带队去。由于常委们对这项任务心中无底，直到天亮，仍无人报名。当国防科委催报时，我说了一句共产党员能如此对待上级吗？郑国仲司令才说了一句：“你带队去，带谁去，由你指定。”

▲ 1967·4·2

步游八宝山，这里清闲。我们的同志到北京后，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街的游行晚上还到处开批斗会，乱得很。同志们牢骚满腹，直问我们怎么办。我说，听党的话，还是驯服工具嘛！好好学习，再苦，也只有三个月，农村那么苦，我们都过来了，这里是北京，安心蹲下。可以多看看，多听听，好好考虑我们进去怎么办，多出点好主意，少点牢骚吧。

▲ 1967·4·26

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参加各国防工业部、研究院的军管人员，周总理指出：各国防工业部、研究院为不夺权单位。你们军管人员进去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动员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恢复正常的革命、工作、生产秩序；解放干部，干部能工作的继续工作，争议较大而难于工作的，迅速查清问题，做好群众工作，解放出来。听了

周总理的指示，对军管工作才有了点底。回招待所，我再次动员，领会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急，军管快进点了。

▲ 1967·5·2

住总参第三招待所，天天都有造反派川流不息，吵吵嚷嚷，我们也习惯了，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内蒙军队也来这么多人，他们也把我们围住回答他们的问题，把我们当成“保皇狗”。我找招待所的招待员解围，招待员耐心地对那些人说，我们是来京开会的，他们才散开。睡吧！我这人倒下即打呼噜。招待员叫醒我说：下面树林内有联动的小卧车，我出去一看，树林里什么也没有。天真的青年人，真未打过仗，一听说联动就吓坏了。

▲ 1967·5·12

再次讨论进点如何办。支左从来没有人干过，加之七机部是搞科研尖端的，915、916又是全国闻名的两大派，最不好搞。根据中央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周总理的指示以及听到的支左经验教训的介绍，经军管人员反复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几条。进驻后总的原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稳定局势。具体做法是：1，两大派关心的核心是支持谁，确定进点后尽快调查研究，提出对两派性质的意见，上报上级研究。在上级未做决定之前，对两派一视同仁，都视为革命派对待。2，迅速恢复革命、工作、生产正常秩序，各院、各研究所、工厂的原来机构照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除运动由军管会直接领导外，其他科研生产、行政、后勤工作依靠原来干部做，军管会派人协调。3，对有争议的干部，组织力量调查，搞清问题，能解放的尽快解放出来。

▲ 1967·5·19

见面会由军管会主持召开，干部和915、916两派群众共10000多人参加。在一个广场中间用石灰划出1米宽的界沟，东边915，西边916，两派人员互不过线，军管人员在界沟内监督。会由我主持，我讲话，首先宣读上面命令，我是三院军管会主任。接着讲话时，有一派的几个人上台，将我话筒夺走，接着又一群人将两旁高音喇叭拉走，中间挂的毛主席大像，也被拆走了，他们那派的队伍也带出了会场，他们的派头头也找不着了。但另一派不退场，整整齐齐坐着在唱歌。此时我们一面派人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无人接。一面军管会开会研究，会开还是不开，经大家研究认为：会必须继续开，理由是，1，我们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大机关派来的，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群众工作的，必须把中央的精神传给广大群众，要相信广大群众。2，还有一派留在会场，另一派队伍虽然离开了会场，但他们解散后仍然在广场里和广场周围的路上和树林里，说明作为独立的群众他们还是愿听中央精神的。3，如果不开，就上了少数派头头的当，即利用军管进点激发两派矛盾，达到扰乱局势，挑起群众与军管会对立，使军管会站不住脚的目的。因此，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开，又重新架起大喇叭，扩音器，另找来毛主席的一张像挂起来。会场较乱，坐着的站着的都有，不管他们听不我听我照样高声朗读。我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是来军管的，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群众工作和稳定局势的，既然敢来，就不会轻易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搞了一通宵，顺利结束了会议。

▲ 1967·5·20

上午军管会又派人分别找两派头头谈话。对闹事的那派头头提出批评，指出这样做只会损伤你们自己的名声，对军管会损失不了一根毫毛。经耐心谈，他们承认不对，但不承认是他们指使干的，是下面少数人干的，答应今后好好地同军管会合作。对未闹事那派头头肯定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对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他们借昨晚的事贴大字报攻击对方，激化矛盾，他们同意了。这天局势还算平静，初战告捷。

▲ 1967·5·21

军管见面会后，总的局势是稳定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也是平静的。但一些派头头老是围攻我们，要我们表态，他们是革命的，军管会应支持他们；另一派是反动派，应取缔。我们也厉害，我们是军人，是来军管的，首先自己内部不乱，团结一致对他们。我们上到下理直气壮地始终咬定两派群众都是革命派，大家都要学习，团结互助，自觉遵守纪律，搞好科研生产。我们态度是坚定的，始终如一的，他们也没办法。

就是不表态，就是拖。

▲ 1967·7·15

经过一个多月的传达学习周总理指示，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思考问题，有一部分群众开始疏远派性组织，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派头头的号召力下降。围绕着两派头头的整风，问题就多了。这哪是两派头头整风，是整我们的，可谓日日夜夜脑都炸了，饭也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上，不断闹革命，革自己的命，革死了，也解决不了两派的问题。唉！还是坐下来总结点经验教训吧！

▲ 1967·7·22

有的报刊提出了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的文章。同天人民日报强调批党内走资派，在全国出现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动向。915、916两派又动起来，近日连续同他们开协商会，我们主持，还好，争也争，但未大吵，有些事我们制止还能制止住，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他们认为我们很单纯，与走资派、军内一小撮来往不多。

▲ 1967·7·31

林×在《红旗》杂志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解放军报也喊揪“军内一小撮”。为防止此情况加剧内部两派的对立，我们建议：915、916目前应减少外部活动，增加内部活动。提高政治嗅觉。今天人民日报猛力宣扬，解放军是柱石，三支两军有成绩，今天算吃了个定心丸。

▲ 1967·8·4

召集915、916头头开会，研究他们提出的再开一次真正的拥军文艺晚会。他们都说，这次是真拥军，我们特别请来文工团演唱，并说忠不忠，看我们今晚的行动。我问：你们请来的是什么文工团？我们虽不懂文艺，但那尖声尖气超八度的声音震动整个云岗，这奇怪的声音，在屋里关窗也堵不住，大家很生气。你们别以为我们是穷小子，不会生气，把我惹火了，我们也会不客气！他们反而劝我们不生气，参加参加，位置留着的。我说：对不起今天有事，不参加。

▲ 1967·8·14

军管人员有四怕：1.怕增加对立情绪；2.怕引起群众斗群众；3.怕引错了大方向；4.怕当罪魁祸首。这一时期，对军管会围攻，够我们受了。军管人员不知所措。还得集合讲讲，稳住自己内部。

▲ 1967·8·21

京内不少政治部被查封，天亮我们去一看，三院上上下下的政治部被封了门，贴的标语，呼的口号是一致的，叫“彻底砸烂旧政治部”、“政治部是公检法”。政治部的全体人员，对抗得厉害，进不了门，就在门外走廊摆上办公桌，在食堂搬来板凳，摆起架子办公。三院有自己的派出所，属政治部管辖，他们好气派，在大街上搭个布棚，摆上桌椅，办起公来。对生了孩子，报户口的，承认封政治部是错误，说几句好话就登记盖印。他们斗争经验比我们行，组织部宣传部档案室，保密柜里的东西，他们早就拿走藏起来了，封了等于没

封，一天也不耽误办公。当时只有三院的731医院还未封，我派（一）位军管去做工作，叫他们做模范顶到底。我并对去的同志说，机械工业部门设政治部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谁也不能砸，医院顶住了是好事。但我们内部就有一位同志不去，还说什么：“砸烂总政阎王殿”你顶得住吗？我再耐心也说服不了他，于是就请我们老红军黄中青去鼓励医院，坚持到底。造反派犯错误，我们自己不能犯。

#### ▲ 1967·8·22

查封政治部的行动如不立即制止，将激发两派矛盾，搞不好就有一场武斗发生，上报请示也不会答复，还得自己救自己。我们研究了三条：第一、查封政治部是错误行动，军管会坚决反对。第二、必须立即启封，恢复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第三、如认为政治部有错误，可贴大字报批判，但不能揪干部批斗。

按上述三条：首先传达到全体军管人员，规定内部口径必须统一。错了一起错，不能七嘴八舌，整顿内部纪律，关键时刻，看谁坚定。

#### ▲ 1967·8·30

我主持拥军爱民集训，首先讲明七机部二院武斗，不能影响我们三院。我们无人指示，自行决定，把住铁路道叉，汽车不让出去（由汽车队负责，因为司机都是当过解放军的，听我们的话）。我们三院虽然受了点外面影响，但还未打起来，两派还能坐下来文斗。

#### ▲ 1967·9·17

731医院的六个休养员，在18号楼围攻我。我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打架有你们，吃喝有你们，牵着狗瞎串，有何病？天天造反有理，你们双方都有理，就我无理。你们自己说你们既不是打人的，也不是被打了的，为何来见我。我只接见打人的人，或者被打的人。你们围我这么长时间，批、骂我半天了，再不散开，我们军管会将同915、916来收拾你们。我是中央派来的，有办法，有权收拾你们。我要走了，谁敢挡道？

#### ▲ 1967·10·27

今天两件事值得记下：1.军委82次常委会议决定体制变动，我们归科委，说这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的，叫“10·25”批示，要我们执行。我们七机部包括干部、两派群众、高科技专家权威，一部分人拥护，一部分人反对。军管会在中间受夹。不管怎样，我们不表态。2.就在今天20：00，我由三院调七机部任七机部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到大机关当个工作人员可以，当部的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干不了！但命令已下，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好到部里报到。

到新的单位，先了解情况，摸索着干。好在三院军管时，已认识916的头头，915的头头我只见过一次面，但两派观点上下一致的，无须多费力，还有个好的基础。部直从10月10日到10月23日办第一期训练班，915、916各抽30名头头斗私批修，大反派性。群众说：群众主动搬山头，头头带头搬山头，搬倒山头有劲头。多好的群众语言，到了部里，也有这样说的。所以两派头头，还能合作。

#### ▲ 1967·10·28

刚到第一天就碰着难题，915的头头王德奎要求召开“10·25”批示庆祝大会。我找916的头头叶正光商量，他同意两派一起开，但国防科委不主张开。结果915一派单独开了。我们军管没到场，因为我们军管会历来不参加一派的群众大会。

#### ▲ 1967·11·6

沈阳三厂军宣队汇报厂里情况，说他们三月宣传队入厂，六月份造反派抢枪，七月恢复正常，8月8日又停产，开始武斗，9月5日中央下命令停止武斗，9月9日中央“文革”

到，9月18日全部撤到楼下，工事拆除，武器交出，但现在白天还抢汽车，上午搞一会儿生产，下午停产。职工不愿到三线，有“恐三线”症。真是一团糟。

▲ 1967·11·9

从部直跑到一院。一院军管会贺主任汇报大联合情况，915还有二十多人打得不敢回来，916的一些爱打的青年在奶牛场集训，还收点效。但六厂一处天天都有打人的人，也有被人打伤的。经常有小武斗。看来三院比一院离京城远一点，好得多。七机部知识分子多，真打也不见得能打出个结果。

▲ 1967·11·18

我同阎主任与916、915谈群众组织总部问题。下午部直宣讲，从目前形势讲到七机部情况，下步打算，讲稿再不像过去随便讲，近传七机部三多（缺席多，迟到早退多，闲扯的多）；又说四多（打扑克、下棋、装收音机、回家的多），还说什么七机部特别怪，骑车没有走路快，按时下班吃咸菜。

▲ 1967·12·22

一院又来了许多人，搞到下午15：10，形成高潮，到16：40选出30人加上一个小头头，将我揪上巴士车（这时我也无力了），开到国防工办门口。国防工办也怪，不接见。他们要把我搞到接待站，我坚决不去，坐在国防工办门口，扶我起来，我也不动。不管如何不少群众知道还算我在七机部蹲的时间长，对我还不敢手抓脚踢，还叫我上车他们送我回部。我明知是假，不动，他们等不住，开车走了。国防工办也无人派车送我回部，天快黑了，我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回到部里。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同住一个楼，都是军人，谁都不沾边。

▲ 1968·1·17

体育馆，总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国防科委部分同志讲话。总理讲形势大好，讲了七个问题。

春节大联欢。晚上部军管讨论大联合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确定了五条：

（1）大办学习班。

（2）大联合必须明确几个问题：1.都不成立大联合机构，部分两派头头可以吸收到机关来。2.余下的头头、工作人员一律回原单位闹革命。3.派性报刊停出，印刷机构交原单位。4.加强部直联革会。5.军管会不参加一派单独开的会。

（3）解放干部。

（4）军管支左，不支派，上下一致反逆流。

（5）抓好科研、生产、三线建设。放周总理讲话录音。坚决按总理指示办。

▲ 1968·1·21

粟裕同志讲：周总理讲几次，点名几次，915、916与各机部都有牵联，都以两大派为靠山。周总理开大会别人想听都听不着，他们不去听，别人上了车，还把别人拉下来。这个人已走到危险的边缘去了。周总理说：这个人经常打电话，他是高干子弟，我只好把电话号码改了。头头派性太重，周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的更不听了。这次要借东风，绕过头头，到群众中去做工作。把总理的录音，直接同群众见面。他没办法，军管不灵，周总理讲话就灵了。

周总理说：铁路定有坏人，客车、军车让通过，钢铁、煤炭、石油不让通过，你们说是什么问题？

▲ 1968·1·23

闹工资，烦死人。一伙青年围着我，我用力冲，谁动我一下，我就用脚踢，我穿东北大头鞋，是我的工具，谁看见也怕，踢一脚够他受。

▲ 1968·1·24

国防工办军管小组负责人陈××批评我们七机部，说七机部抓516，核心人物你一个未动，不理解。好像我与516有什么关系。他讲话我光听，不吭声。我有我的老经验，毛主席说过错杀人，20年后还要昭雪。我未弄清谁是516，我是不会乱抓人的。近日又谣传什么七机部不抓516，七机部是516的窝子，516的核心在七机部。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什么中国共产党，什么东北人民党，什么××组织十二个常委有六个在七机部，二个人民党都有三个头头在七机部等等。乱七八糟。上面除周总理外没有人说一句好话。难办，难办。近日武斗又多起来，谣传不管它，自己军管人员不能不提高警惕。最后粟裕同志说：总理讲的话语重心长，我们再不搞好，就要犯罪。陈××说：粟裕同志叫我到七机部来点上火。削平山头，撤消组织，915撤消总部，大方向是正确的，915快，但不要甩掉916。916说过一礼拜撤，我们说过两个月也行。915不放心，916不死心。打架，两个人打架两个人都不对，不管你主动被动，别人不准参加，参加了，我找有关负责人是问。

▲ 1968·2·7

从今天起大批派性，做法1.论危害，2.揭恶果，3.剥画皮，4.列罪状，5.诉罪恶，6.找实质，7.挖根子，还加上什么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封建主义等等。有的人只是口上反，实际还照样干。

▲ 1968·3·20

二院冯××来谈生产。接着二院915勤务员插上来说：“你们不抓狐群狗党是错误的。”我说：谁是狐群狗党？你们不按总理批示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现在你们还互相攻击，是要犯错误的。又有人提出：你们军管会为什么不贴标语。我说：谁都知道，我们和军科来的军管同志从未在七机部贴过一次标语口号。

▲ 1968·3·21

我在部直联革会上讲了以下几条：1.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95%以上的干部，95%以上的群众。对大字报不符合此精神的，要通通盖起来。2.坚信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总理已讲过几次。你们不是说响当当吗！响当当就应立新功，应鼓足干劲继续革命。什么“反戈一击”，什么“投降”。反什么？击谁？无非是打内战，都想压倒对方，这些都是错误的。3.站队问题，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过去是“非”现在就“是”了，是了就是了。不要在站队问题上没完没了，无限上纲。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广大群众来说是认识问题，对个别人属立场问题。造反派有缺点要改正，要给他们以改正的机会。允许他们有一个认识过程。4.不要另立山头。916中有部分人的观点，提法是对的，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的。915和916都应该支持他们，不能另眼看待，不能压他们，压是压不服的。但是他们中有少数人，想另立山头，我们军管会是不同意的。群众组织中有些人对自己的头头有气，想整一整，可以理解，难免的事。但首先要有诚意，整顿纯洁自己的队伍。只能整好，不能整垮，凡是想整垮别人的人，结果总是整垮了自己。群众组织的头头要让人讲话，应欢迎别人提意见，改造自己。5.不要提出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口号，不要随便点名，如×××反革命集团，抓×××的狐群狗党等。对我们军管有意见可以提，有缺点错误我们改正。6.不准搞逼、供、信，不准搞喷气式、变相体罚。7.不要随便指定坏人，不要把平时好吵嘴打架的人都当坏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帮助团结犯有缺点错误的同志。

▲ 1968·3·27

下午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揪出杨、余、傅，打倒杨、余、傅。在我们七机部谣传很多，什么：一院顶住了，二院瘫痪了，三院垮台了。围绕着国防科工委召开学代会争论不休，甚至有武斗。国防科委通知七机部参加他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条件中，有一条限制了有一派群众组织不能参加。这样，不但不利于大联合，反而会激发两派矛盾，不堪设想的后果。为此，我们部军管会提出不参加国防科委积代会，而参加国防工办五月份召开的学代会为好，国防科委不同意。再后军管会决定，我们都不参加，代表他们自己组织选，不但不参加，部军管会为此也不发任何文件，并退回了他们的一大堆“红旗漫卷西风”。

#### ▲ 1968·4·4

新军管会的同志陆续到齐，老军管撤出。不知为什么，换主任不换我，我走不了，老军管还要同新军管共同工作几天。今天组织五个小组到各省市抓工厂，计40人。

国防工办军管负责人陈华堂传达周总理指示说：西单商场3月30日18：40发生爆炸事件，死5人，重伤40人，轻伤45人……，这是北京去年8月2日发生大武斗的第二次，事前曾有匿名信报告此事。他们要血流三个部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北京市革委会。总理讲：要立即破案，要加强保卫几个机关。

#### ▲ 1968·4·17

部科研生产组郭贵、刘九皋汇报生产情况。接着有几位头头找来要揪杨、余、傅后台。我问：后台是谁，他们直答说是李、聂、叶、徐，还问我除了他们，还有谁？我也直答：“还有谁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应独立思考，勿须打听我”。

#### ▲ 1968·4·29—30

新来的军管规定：早上到食堂吃饭，要先念毛主席语录，背毛主席的“老三篇”，所以我早上再也不到食堂吃饭。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几个军管。因我们到七机部后，从阎主任起从不在食堂吃饭前念语录，背“老三篇”。新主任在一个小会上批评我说：“怪不得你们未把七机部搞好，连‘老三篇’都背不下来。”我心里明白，你恐怕还不如我，我还能背下几句。主要是那么多人在吃饭，你背书呼口号后才吃饭，有何用。所以只要他到食堂吃饭我就不去。

#### ▲ 1968·5·16

薛长勇同志谈，引导站组建问题。今日三院武斗，蒋昌应同志（日记作者的秘书——编者注）去制止被打，要拖走他，他死抱住电杆不走，高声叫来人。军管到后解围，身体受伤。249厂，不干活，闹事快到头了。蒋昌应经检查后，送回基地医院治疗。军管挨打还不能吭声。

#### ▲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火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 ▲ 1968·6·10

为解决武斗事好难哪！一夜未眠。为解决姚解剖问题，我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因七机部复杂，他们不大愿意来。经再三请求，他们提出三个条件：1.保证法医安全。2.两派不准参加。3.家属不准参加，否则公安局不派法医。我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这才同意来。

#### ▲ 1968·6·12

召集915、916两派头头开会，张翼翔主任参加。研究制止南苑发生的6·8武斗和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经耐心做工作，两派共同商定了六条：1.疏散人员；2.双方人员撤出武斗现场；3.食堂开饭；4.211医院拿出整改措施；5.发工资；6.双方交出武斗工具，集中起来由军管会处理。军管会还规定了五条：1.群众各回原单位。由军管组织学习；2.721、731医院都要按10条执行；3.伤员生命垂危，允许家属探望。双方扣的人交军管会，保证安全；4.带头抄家、冲医院的人，要揪出来；5.组成执行协议、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各派三人，两派总部各一人。为制止武斗，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关于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派来法医庄明漆、赵金龙解剖，但必须答应他们10日提的三个条件，否则不来。我同意不变，两派也不阻止。

解剖姚的尸体，他妻子不同意，耐心做了一夜的工作，还是不同意，逼得我发火了。我说：“老子不管了，如不解剖，权威部门不做出结论，将来别人说姚桐斌同志是自杀，看你咋办？”这时姚的妻子才同意。解剖了，姚妻出门后，又进来三个年龄稍大的，向我威胁说：姚桐斌是周总理从德国要回来的材料专家，你们无故打死，你管不了，我们抬走，到天安门游行，向世界公布。我答：你们来得正好，抬走吧！他要我向总理报告，我打不通。又提出向外交部报告，我答：抬走吧！不要罗嗦了，我要休息！三人自动退出了。又出了问题。到何处去解剖？国防工办联系去301医院，不行。到空军总医院，不行。我只好去海军总医院联系，同他们做工作也不愿意。我说，同意不同意也拉到海军医院来，他们只好同意，但也提出三个条件，他们不参加人。唉！谁都怕七机部的两大派。解剖地点定了，但拉尸体的车哪里出？我请海军帮忙出车，不行。请空军帮忙出车不行。最后国防工办说由一院出车。因人是一院的，我给一院打电话等于白打。没办法，决定向运输公司租车。他们听说是拉尸体的，有车也不租。还说什么：七机部游行出动车最多，还租我们的干什么？最后逼上梁山，叫七机部部直汽车队队长亲自开车。并规定他不准问干什么，不准看干什么，听我指挥，叫开哪就开哪。这个队长真不错，都听我指挥。天难！地难！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搞了我半天，真是晕头转向啊！最后总算把尸体拉到海军总医院解剖了。可是正在解剖中，姚妻又提出问题，只好耐心做工作。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桐斌同志是钝器伤头致死。

#### ▲ 1968·6·13

我被群众组织的一些人弄到部直南楼，围攻我，大骂我，要我立即抓出凶手。我说凶手一定要抓，但我一个人能抓出来吗？围攻从06：30—11：30，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呀！无怪七机部在最困难时无任何领导或参谋干事来帮助一下总理。我曾亲自听总理鼓励粟裕说：粟裕你七战七捷，怎么今天成了个大姑娘。以后曾听群众传说：粟裕坐了直升飞机到南苑上空转了几圈。

#### ▲ 1968·7·31

为落实毛主席7·28关于大办学习班的指示，我到群众中去找办法。我听取了技术司、科研局、计量站、劳资司、计划司、915、916头头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五条。

（1）从大联合开刀，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应该联合。

（2）一派撤消，一派留着的情况下，要联合是不可能的，撤消与不撤消的都应该限制其不利于大联合战略部署的行动。

（3）借东风，大力宣传毛主席的7·28指示，讲清形势。

（4）军管人员忠不忠于毛主席，紧跟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跟则要旗帜鲜明，依靠两派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5）大宣讲，大宣传，各院各找个工厂试点，下决心：1.与群众组织脱钩；2.关着门闹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3.人人上班，坚守岗位八小时；4.揪的干部立即交出，由军管会管理；5.联革会立即恢复工作；6.成立革命领导小组；7.不武斗；8.开展大批判。不怕反



复，反复一次，深化一次，群众厌烦一次，动员工人立即回厂生产。最高标准达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本厂不参加派性活动，大联委正常工作。

征求群众意见，群众反映好，建议军管按7·3、7·4制止武斗、办学习班的办法做。还有30几起打人事件，不管哪派都得处理。各种各样意见，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

#### ▲ 1968·8·6

我们到国防工办军管小组汇报，粟裕等同志在场。最后粟裕、陈华堂、张培元等，研究的一致精神：

1.不要急，急无用，要做工作。2.916表示各部委问题，国防科委问题是三军问题，我们不引导，又不限（上级不了解情况，你能限制吗？）3.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搞，这是战略布置，不能打乱。

#### ▲ 1968·8·14

国防工办六楼，陈××讲了几点。说916，还骂了我们。还是用恩格斯的话来判是非。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我早听说过：工宣队、军宣队要进七机部，以为是谣言，后有人告之才知有此事。我们曾经请示国防工办，快点给我加队伍，陈××骂了我们一通，没有人，靠自己。结果，不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周总理说的几千人。不过陈××不知道而已。

下午张翼翔同志召集会议：下周继续批多中心论，第一步造声势，第二步挨门挨户做群众工作。

#### ▲ 1968·8·16

上午陈华堂同志讲：昨晚谢副总理交待两件事：1.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根据七机部当前形势，决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七机部，1500—2000人，其中军队500—1000人，工人1000—1500人，时间一个月，长或短还不清楚。

粟裕：我个人理解，根据上海的经验：

- 1.上海工人左右局势。
- 2.解决北京学生问题是工人宣传队。
- 3.毛主席送芒果看出中央的意图。

王展同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厂时要热烈欢迎。

#### ▲ 1968·8·21

黄作珍同志谈：38军、56军军宣队来京，欢迎。军队人员召开个会，还请谢、温、郑讲话。北京情况很好，主席批的7·3布告，又接见五个总部的负责人。8·15又接见首都工宣队与工人代表。700万人活动，对各方振（震）动很大。但大有大的难处，200多个单位（大专院校除外），还有189个有问题，（七机部、国防工办不在内）。任务是很光荣的。你们两个团，38军334团到七机部，579团负责7所大专院校、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乐团等。七机部去3000多人工宣队。军宣队1500—2000人（还未定），总共到七机部5000人左右。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的任务：

- （一）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双方抓的人，放人。
- （二）坐下来谈判，达成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
- （四）整党，精简整编。长期打算、持久战、手抓沙子，有土才长庄稼。

几条要求：

- 1.不轻易表态，表态则由集体研究讨论。

2.作调查研究工作，把各派的历史情况摸（摸）清楚，模（摸）一下他们的功和过，模（摸）一下地富反坏右、走资派。

3.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9 1 5、9 1 6，不能一派吃掉一派，一派压一派，谁也不能吃掉谁，谁也不能压垮谁。吃掉、压垮都不是办法。这是我们的认识和支左工作的根本依据。

#### ▲ 1 9 6 8 • 8 • 2 5

在人大礼堂三楼，谢副总理讲话。到会的有3 8军之3 3 4团，6 5军之5 7 9团排以上干部。谢说：“解放军不听毛主席的话最可耻……要调查研究……不要亲一派，疏一派。3 8军要注意一下，今天我们开欢迎会，你们要支一派，我们就开欢送会。干部要集中学习，你们去的地方有的干部靠听小道消息、谣言过日子。听不同观点的意见。干部要做好工作解放出来。到七机部的军宣队、工宣队3 0 0 0多人，军宣队2 0 0 0多人。工人是文革的主力军，他们不怕解放军怕工人，工人越顶越硬，要配合好要向工人学习。保持好作风，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遇事多请示报告。准备长期撑下去，当心糖衣炮弹，阶级敌人会采取各种手段拉我们。我们相信3 8军、6 5军会完成任务，做出成绩。”

#### ▲ 1 9 6 8 • 8 • 2 9

首都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下午即开始工作。

今日各院情况：

一、二院，部直上午开欢迎会，三院下午开，到会人成倍增加。7 1 1医院，2 0多个伤病员都出来欢迎。7 2岁老大爷说：“七机部这个马蜂窝就是要捅。”“工人阶级要左右革命形势。”

到处请示，军管怎么办？院有大联委，成立革委会大联委怎么办？×××住的大院，不腾房子，腾了的又留二人怎么办？文化宫进不去怎么办？

组长说：

（1）敌人、坏人、派性重，会骂工人是工匪、骂军队是混蛋。军管人员犯了错误，就要查，大会讲穿。

（2）当前造反派，从上而下，开大会一级一级地搞。然后从下而上搞，将来也可以直接成立革委会。

（3）头头组织学习，要住在一起。宣传队早上出操，外出请假。

（4）将来办学习班，工人上课，批判各种错误思想。

（5）情况上报，除四家外，报总理要每天报一次。

#### ▲ 1 9 6 8 • 8 • 3 0 — 3 1

粟裕同志讲话，军管要做好工作，做两派的工作。

1.宣传队是中央、北京统一领导的。聂元梓靠边站，她想不通，工人说：你问中央。

2.我原说过，革委会群众不参加，吸收工人参加，现在看起来要大联合。

3.当促进派。

4.你们的报告把军管放第一，应改成工人第一。进点后，领导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 ▲ 1 9 6 8 • 9 • 2

两派群众报喜！七机部两派真正大联合，削平山头、交印、断电话。9 1 5下午一点半集合七机部9 0 0多人，2 5辆卡车，在北京城游行一周，到天安门集合，分别到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国防工办报喜。上午我们到9 1 5总部的善后工作组去看看。

3 8军军宣队刘崇礼讲：

三日下午开庆祝大联合会，在会上由群众组织头头交旗，交印……等。军人不说话，工人老大哥敢说敢干。最近几天，战士普遍反映：疲劳，吃不消，饮食不下、裂嘴、起泡、睡不好、吃不下、适应不了。请问军管这些老同志，怎么应付的（得）了，我们一下适应不了。

晚上我看他们，介绍一下我的经验。凡是换一伙人，就特别紧张，又是天天闹革命，又是下操，背老三篇，我也不适应。我不能吃点心，为何？因1967年才来时，吃不上饭，吃点心，伤了胃，北京的饭店我基本吃光了。晋阳饭店闫主任吃山西刀削面，他走后我到前门四川馆子吃担担面，公主坟吃饺子（是富强粉的），动物园门口的饭馆最全，广东味、湖南、山西、陕西都有。到三院朱家坟吃驴肉，姑娘总是给我留一斤二斤带回来吃。甘家口腊肠，七机部马神庙麻花也好。总之养成习惯。我总感到军队同志不习惯，好在西单吃小笼包子（狗不理）就得等的时间长点。自己找长凳，自己排队。首先你们排队不习惯，在工厂尤其要自己找碗，自己去买饭票等。想当官老爷不行。

听说你们吃过窝窝头，吃着吃着就打起来了。我是挨过窝窝头打的，但挨了不能讲，干挨。晚上得自己先搞一壶开水，一可洗洗，二可放点糖，喝了就睡。饭堂最好不祝万寿无疆！

#### ▲ 1968·9·11

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研究毛主席接见事：（1）编队；（2）指挥；（3）接见人员分配；（4）编组方法，估计是今年国庆节接见。

20：00 栗裕同志讲中央文革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文件、布告要组织学，军队也要好好学。北京50个大专院校真正搞武斗的只有八个。老干部还犯错误，青年犯错误就不治病救人吗？

机关在减少层次，减少部门、减少人员。军管工作，凡是进入了宣传队的单位，军管人员要撤出，将来都要撤出。怎么撤？同北京市商量，这是中央文革决定的，结合的不算。

讲话、学报告，你们一定要提中央文革，这不仅仅是一个组织纪律，而是立场问题。

对红卫兵的功绩不提，也是不好的。我们追问他什么是二月逆流？（说真的，我们也搞不清，我看他也讲不清）他说：去年二月，谭震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发了一顿脾气，说：他四个不该。

1.不该活到65岁（63岁死了就遇不上文革）。

2.不该参加共产党。

3.不该跟毛主席四十年，说完就夹着皮包走出会场。他说：周总理都搞不清楚，你们不要再去追问细节，比较难说，搞不好，还被人利用，攻击中央就不好了，又犯错误。

4.……

#### ▲ 1968·11·10

上下午在国务院开会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周总理讲话，听不清，大意是：

农林口垮了。我办公室仅二人，五组12人，今后各部有事打业务组，一言为定。这次传达规模很大，未成立革委会的暂不传达。要推动一下，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推动一下。周总理说：我最近忙于各省的事，国务院的事管得少些，下一步抓一下各部委工作。这次讨论当前工作，军管人员全部参加，干部抓业务的司局长参加……周总理问：七机部联合起来了吗？张翼翔主任答：十月成立了厂所革委会。最近学习班派性又发了，916说他们什么都对，915都不对。周总理说：不能说916打×××都对。大批判清队，批人也要批自己嘛。对老将一批、二保、三看，对小将也如此。保还是要保一保，没有绝对纯的东西。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就那么纯吗？我看不见得。但大部分是好的，大节是好的，要严谨谨慎，不要逞强，不要在会场发生问题，冲淡庄严的大会。生产由军管人员管起来，军管人员不能撤。不要上街游行。

▲ 1969·2·9

国防工办开会。粟裕讲话，听不大清。16：00周总理到会，讲1969年计划安排尖端和大联合、革委会问题。周总理说：大联合，对等不对，应是平等原则。根据政治上平等，通过充分协商。有人插话说：对等少一个不干，不是一碗水端平。周总理说：一碗水端平，你知道有多少成份，如何划分对等？什么对等，保险混水占多数。大联合不是对等，是在原有基础的补台。

▲ 1969·5·1

周总理听汇报。工宣队汇报，我们部工宣队21个单位3000人，军宣队18个单位2000人，共5000人。周总理对工军宣队负责人说：“我和他们打了三年交道了，他们表面上听话，实际上不听话。在学校把他们带坏了。有些头头表现很坏，派性作怪。”周总理说：“你们对两派不要表态，坏头头由他们自己来揪。”有人说：×××站警卫连陷进派性（915给他们作形势报告），高锐说：“要换，”（我看算表态了）周总理说：“不能！”“要调警卫连会出问题的，坏人就乘机挑动。”……当告七机部有些地方工人不能去，（保密）周总理说：“清华不是什么地方都去了吗？难道工人还不如知识分子保密。”

当汇报说七机部总的形势大好，周总理说：“七机部不能说形势大好，说大好的话是暴露了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条件。”汇报说：“两派闹派性，想把两队一起搞垮。”周总理说：两队……是不能搞垮的……看来今天是不能解决问题。提几个题目回去研究一下，明后天报来。

部院两级头头有多少？搞个名单。起作用的头头，（姚讲有21个，周总理说49个为何又变成21个头头呢？）名单不超过100人，已报了98个。

▲ 1969·5·7

周总理到。工、军宣队汇报两队到七机部八个月的工作。工宣队王学武汇报说：“一院一个工人失踪了。”周总理说：“2000多人为何一个人失踪了呢？”王：工宣队挨了打了……二院地下有死尸，38军破了案。周总理说：“进去不要急嘛，摸清情况……。”因工、军宣队内部有矛盾，周总理这次接见，我们听出来了，不是一般的，大范围还是第一次。是做两队一会的工作。开会前，我们军管会也做了研究，当周总理问工、军宣队和七机部情况时，我们军管如何回答呢？真难！总之大家少说，让事实作见证人。如周总理问到：

（1）接管（我们也难）；（2）办学习班；（3）撤出（怎么说呢？我们军管撤出）。我们把握住一条，只讲两队的成绩，我们自己不做自我批评，只讲我们工作未做好。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军管做到：掌握原则，不包、不推、不抵抗（反驳）、不刺激两队、不发脾气。目前形势是：（1）军宣队闭门不外出；（2）工宣队极想交权；（3）整个七机部瘫痪（三线派不出人，13所不开火，249厂断炊，×××站不试车……等）；（4）革委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915、916双方扣的人都不放。

18：40国务院开会，915头头王德魁、916头头叶正光各带一人，在我主持下，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交出所有武斗工具和扣留的人。周总理11日02：25到会，同意这个协议，总理当场把交出武器的时间改为11日12：30，11日15：00交人，并将我们写错的“欧打”的“殴”改过来，纠正小报的错误、错字。并嘱咐即发公布。周总理说：“由卫戍区监督实施。”周总理叫粟裕讲话，粟说：“今晚达成协议很好，坚决执行。”周总理又叫吴忠讲话，吴忠说：“周总理讲了916有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人要交出来，要交卫戍区法医检查。916不要搞报复，要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粟裕最后又讲：“周总理接见十七次了，每次我都参加，至少五至七个小时，周总理管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我们工作未做好，内心不安，七机部担负着党和国家的光荣任务……两派要团结，要三结合……”周总理请叶正光讲，叶：“坚决按周总理指示回去做工作。”叫王，王讲：“坚决执行，回去做工作。”唉！双方争论一夜。艰苦朴素的国务院吴庆彤陪我们一夜，好累呀！中间一个人说散会，谁也不听。

▲ 1969·5·16

一院对立增长，915被动，916又活动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工宣队受围，我们是解围人。为一个“新”也要争。周总理几次讲：“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谁想压倒谁，谁想占优势，都不行。”下午到三院，101站、159厂重点抓101站，要求三院保证试车。

晚上，915一伙人围着我解答问题，我想了又想才大发雷霆地批评了915：指出他们（1）对栗裕、陈华堂；（2）对两队；（3）对916；（4）对革委会；（5）对下放等五个问题认识有问题，要纠正过来。我立即吐出我的观点：栗、陈打不倒；两队有成绩；916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革委会要成立，人不适宜也得吸收；下放坚决按任务办。请他们回去告诉915的头头王德魁，好好研究我的意见。把错误的认识改正过来。周总理七、八、十日连续三个晚上开会，找915、916头头谈话，都是为了搞好团结吧。

▲ 1969·5·22

接到周总理批示：“即送栗裕、陈华堂两位及七机部军管会，两队领导同志一阅，审定。及早火化尸体，给家属抚恤和做916工作，无论如何不要开追悼会。只应将仇恨集中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分子一伙人身上。处理望告。”（周总理的上述指示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七机部工人×××被打死验尸结果报告上的批示）。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结论是：“综上述尸体检验的结果，我们认为×××因全身……导致外伤性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 1969·5·24

工宣队连以上及主要骨干于5月19日集训走了。军宣队因“军”不便怎么，但经常向我们汇报情况。我们只合（和）稀泥。有一派是重点搞军宣队，从表面看是针对5·8武斗。攻击军管会不坚持原则，合（和）稀泥。实际是攻击军宣队。另一派是逼着你支持他，打死人要三家去慰问家属，要三家负全责。

▲ 1969·6·10

国务院开会周总理讲夺权问题：“各部委、各级和司局都靠边站，并不是走资派嘛。既是走资派也不是死不悔改的嘛……党还是讲民主集中制……各部要有个领导小组，小组人选要严格些……先搞起来。改！也不可能什么都改。你难道说交警不要了？人民思想水平还未走到这一步。二个人不准骑一辆自行车，他就不听，你就不能不干涉吗？对敌人我们要专政没有警察行吗？科学院同国家科委搞成一个组织，高新技术局，国防科委吃不了3000多人嘛！不能什么都管。”

▲ 1969·6·16

08：00，向栗裕同志汇报139厂技改生产海防导弹问题。并汇报了三家领导关系难于处理。栗裕同志说：你们又要求增加基建，你们少建点不好吗？

晚上国务院会议厅开会，21：50周总理到会。会开到17日06：00止，这次八小时有余。周总理对群众真耐心，是我辈典范。他讲了学习毛主席的耐心，同五大领袖谈了五小时。教育我们看看报上的报导，更受感动。但不知何因？我们对小将觉得太不象（像）小将，要是战争年月，早就解决了。和平争论没个完是小事，我们却也是在消磨周总理的时间。这次会中，我想冲一次，但一见周总理一直耐心教育，我再一次要发火都被压下去了。我也看了老将不少，他们不说话。如说得过多，当然时间就拉长。我只要说一句，就可能使两派攻击开始，便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作导火索。因而也就想到，不说为妙，还可早点休会。

（1）七机部优越感，超人几等，又臭又硬，盛气凌人。

（2）知识分子成堆，帝资修留（流）毒很深。

(3) 长期以来, 技术第一, 专家第一, 不突出政治, 物质刺激, 不成为老大难倒违背逻辑。谁的话都不听, 任务是最高司令部下的, 发射一次成功, 祝贺电、慰问电, 使他们尾巴翘得天高。

也有人讲: 我们工作有错误, 支一压一, 学代会压了一派, 支持了另一派。从良心上讲,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 ▲ 1969·11·10

国务院会议, 周总理到讲话: (略)。撤两队。二、七部归国防科委。18:30 各院才到齐。周总理说: “我主张撤, 你又不撤, 你们用个办法去一批一批地撤。” “什么验收?” (要两队搞好验收) 周总理讲: “讲清楚了, 就可以撤。” 张讲: “撤! 915 送瘟神, 916 挽留。讽刺(干部又讽刺二队)” 都会有。周总理讲: “不准如此做。要做工作, 军管会要做细致的工作。”

周总理讲: “军队要备战, 工人要回去生产, 在七机部他们的工作取得了成绩, 得到了锻炼, 学到了经验。” 有人提出工宣队不愿撤咋办(因军宣队好说)? 正好谢副总理来了。周总理说: “他们不错, 做了很多工作, 很辛苦。他们是一起来的, 一起走。” 请谢副总理作(做)工作。

#### ▲ 1970·1·10

向国防科委汇报:

(1) 下放军垦——应走10160人(实走9710人, 未走450人)。

(2) 下放五七干校——应走2630人(实走1538, 未走1092人)。

(3) 党员11688人, 受训5827人。

(4) 革委会应成立45个, 已成立42个, 革委办事机构, 应成立45个, 已成立6个, 革命领导小组应成立321个, 已成立140个。

(5) 清队总人数511793人, 清出1018人, 中特215人, 叛49人, 走21人, 五类40人, 现行反274人, 自杀24人, 已死13人。

#### ▲ 1970·2·26

下午在二里沟参加北京市电子会战会议抄资料: 毛主席谈不设国家主席, 从1970·3·8—8·14讲了六次。(1) 1970·3·8, 不设国家主席; (2) 1970·4下旬林宗信×××, 毛主席说“此言不妥”; (3) 1970·5陈伯达搞了个法治研究会, 背着中央起草宪法, 社论, 九二陈为太上皇; (4) 1970·7·17—20日陈叶合唱, 设主席写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5) 1970·8·13“天才”、“三个付(副)词”, 当天下午吴电话给黄、胖子派军作战, 叫李快回来; (6) 1970·8·14—19李、黄、邱三座门开会准备语录。

#### ▲ 1970·3·7

为老家购广播机, 从甘家口银行取出1600元, 1000元寄上海, 汇费10元, 600元仍存银行。汇上海杨浦区行, 已由公社汇去12200元, 购gy2275W的2台, 2月交货。6360元一台, 贫下中农老山沟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我多高兴。要是毛主席在“九大”讲话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到, 那我再寄2000元也干。

这钱怎么来的? 是中华牌香烟钱, 我不抽烟, 每天一盒烟0·6元, 从1960年起日积月累, 目的是将来回老家用。虽过去已给公社赠过1000元, 但未用在点子上。如该款公社照补给我, 我还是集中存。将来我可为公社购台汽车。

□ 来源: 《天涯》2000年第5期

~~~~~

## 【往事非烟】

### 鲤鱼洲纪事

• 龚人放 •

一首名为《敕勒歌》的北朝民歌云：“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位于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没有牛和羊，只有狐狸和豺狼。北京大学偏偏选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建五七干校。

1969年12月5日，北大第一批教职工一千多人，乘专列奔赴南昌。那一年我已经五十四岁了，妻子和儿女们到前门火车站为我送行，彼此心情之依依自不待言。大概是为了壮壮下放队伍的行色，列车上播放了一首首革命歌曲，其中有《游击队员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火车上一路开展动员宣传工作。俄语系点名要我发言，我说：“这次到鲤鱼洲去，我一定在艰苦的环境里好好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接着几位老教师也相继发言。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南昌。稍事休息，下放人员分别登上几艘客轮，拔锚启航。赣江两岸灯火若隐若现，江上浪花闪闪。当天深夜来到鲤鱼洲。靠岸之后，眼前是围湖造田筑起的十几米高的防洪大堤，背后是波涛汹涌的鄱阳湖。我们背上行李，手里提着绿色的帆布手提箱，顺着水泥铺成的斜坡往上爬，又顺着大堤背后的土坡走下来。当天住在后勤先遣队搭好的草棚里，一群群蚊虫飞到这里来吃“夜宵”，咬得我满身起大包。

干校请来有经验的木工，带领几位能干的教师，把长长的毛竹用铁丝缠好搭起房架，盖上稻草，盖了三所大房子作为宿舍。教师按军队编制分为若干连，东语、西语、俄语三系为“九连”，搬进新盖的大房子，一所住女教师，两所住男教师。没有安装电灯，夜里漆黑一片，令人莫辨东西。一位男教师王××夜里上厕所，回来误入女教师宿舍，他摸黑走到自己的床位，住在那个床位的女教师吓得惊叫起来，顿时全屋大乱，王××急忙退了出来。经过工宣队调查研究，证明确实是走错了门，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后来在宿舍门上安上了电灯，要不然还不晓得会闹出什么笑话。

周总理关心北大教职工的安全，下令江西省协助加固大堤，以防洪水袭击时造成不测。干校买来了扁担、竹筐和铁锹，组织下放教职工参战。这锹和一般的铁锹不同，是一尺多长、六寸多宽的梯形长锹，使用时一脚踩入黏土，拔出来在对面和左右两侧各踩一脚掘出一块长方形的黏土块，装在筐子里挑上大堤。工宣队知道我在景德镇修铁路时当过“测目”，因此派我在大堤上指挥。我让他们把挑上来的土块沿着大堤的外沿倒成一排又一排，一直倒到十尺多宽的大堤的北沿。大堤上有一条三十度的斜坡，可以上下汽车和拖拉机，拖拉机上把铺好的土块压平。这段大堤修好之后，转到另一段去加固。此外，江西省派来一百多民工，加固西边一大段。大堤加固竣工之后，各连“战士”（即教职员）去平田畦。

12月底干校指派老中青十三人组成“新北大教改小分队”，成员有东语系的黄炳美（华侨），中文系的向景洁、谢冕，俄语系的董青子、李音波、许聂彦和我，另有一位女护士随行，奔赴井冈山。我们打着“新北大”的旗号。由工人蒋师傅带队，来到南昌，当晚住在北京大学南昌办事处。翌日清晨，背着三十多斤重的行装去汽车站。雪后道路泥泞，我摔了一跤，爬起来追上小分队，到了汽车站，坐上漂亮舒适的大轿车，出发上井冈山。下午五点多钟来到井冈山脚下，在一个小饭馆吃晚饭，喝碗米酒，感觉身上热乎乎的。

“前面大雪封山，山陡路滑，为了大家安全，今天不走了。”司机说。

“明天可以上山吗？”蒋师傅问。

“看样子明天也不行。”

“那什么时候可以上山呢？”

“那要看情况啦。”

蒋师傅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们要以红军过雪山的精神，夜过桐木岭。”他让全体队员在门前排成一队，喊道：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

我们听从号令，像战士一样出发了。蒋师傅为了鼓舞士气，带着大家唱起了根据毛主席词谱曲的《长征》歌：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

小分队里数我年龄最大，走了一段路与大家拉开了距离，落在最后面。我累得满头大汗，真有点走不动了。蒋师傅过来给我鼓劲，许聂彦一只手托着我的行李往前走。公路两旁高大的毛竹被大雪压得弯弯，形成一条洁白的通道。这美丽的景色映入我的眼帘，给我增添了力量，一鼓作气又走了十几公里。

忽然听到马达声，一辆卡车出现在我们面前。蒋师傅急忙举起“新北大”旗帜请求停车，司机看见“新北大”几个字，停下来让我们坐上汽车。新北大是文革的先锋。国内外几乎无人不晓，我们凭借新北大的“威风”，一路畅行无阻。

深夜11点多到了茨坪。蒋师傅要给车钱，那位司机说：“大家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怎么能要车钱呢？”

当天夜里我们住在第一招待所，睡在用木板搭起的通铺上，每人每天宿费一角钱。第二天小分队去瞻仰红军将领故居，然后去烈士纪念碑向烈士献上一束花。中文系谢冕念了悼词，大家鞠躬致敬。

茨坪是革命圣地，我们在街上逛了逛，买上些纪念品：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五大哨口风景照片，等等。

一天夜里，蒋师傅把铺盖叠成豆腐块，枕在头下，不一会睡着了。躺在他身边的向景洁，外号大象，觉得蒋师傅这样做其中必有奥秘，便向我们使个眼色。大家对此心领神会，各个做了准备。天刚蒙蒙亮，蒋师傅来个突然袭击，吹起口哨来，哨音刚落，他喊道：“外边集合！”



我们几个男教师只用了五六分钟便来到门口集合，几位女教师毫无精神准备，过了十多分钟才来到门口。蒋师傅说：“今天我们爬山，拉练，目标是前方那个山头。”

1、2、3——4！这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跑了几分钟。女护士小杨的背包散开了，被子、毯子、杯子散落在路上。大家一阵笑声，蒋师傅看她实在不能拉练，就吩咐说：“你回去吧。”不久果然打发女护士回鲤鱼洲了。

我们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向贫下中农和各界征求关于高校教学改革的意见。我们首先到山下一个叫“那山”的地方，访问了几户贫农。一位老贫农说：

“解放后我们生活好多了，大儿子上了中学，学习很好。你们能让我独生子上北大吗？”

我说：“你让儿子好好念书，总有一天能上大学嘛！”

另一户相当贫困，老农坐在竹椅上抽旱烟，十一岁的小孙女把打来的两捆茅草放下来，温顺地坐在爷爷身边的小凳上。

我问：“老人家多大年纪啦？”

老农回答：“七十多啦，身子骨不好，干不了重活。老伴过世了。儿子和媳妇在山上饭馆里做事，他们有饭吃啦。孙女上山打柴，还帮我做饭什么的……”

“小孙女上过学吗？”

“没有，不认字。”

我又问：“你说，大学应该怎么办？学些什么？”

老农未作声，小孙女插嘴说：“学认字，会写名字，会算账就行了。”

显然爷孙俩都不知“大学”为何物。我们教改小分队分三个小组，到附近几十个村庄了解农民关于教学改革的意见，反馈大体上都差不多，大家不知道回去该怎么向领导汇报，我们总不能按照主观的想像编故事啊！

乘这次到井冈山的机会，我们到中小学去采风，收集了二十四首民歌。我记得最好记的一首民歌是：

一根扁担两头弯  
毛委员用它把米担。  
来回走了百余里。  
从宁岗一挑挑上了井冈山。

大家向蒋师傅提议：“我们扩大调查范围，到韶山去看看。”

蒋师傅无奈地说：“钱已经花光了。”

我说：“这好办，我们以‘新北大’作担保，向招待所借点钱不成问题。”

这一招还真管用。我们借了钱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参观革命纪念馆。住了一天，钱还有剩余，又去安源革命纪念馆受教育。折回井冈山时，干校寄来的钱已经到了，我们还了账，高高兴兴回到干校。本来准备向全体人员作汇报，领导事先听了听觉得没有什么教改方面的内容，也就作罢了。

干校正在平整稻田。

孙念恭做了一个泥爬犁，爬犁下面加上两根横木，爬犁上面压上几块石头，他拉着爬犁，平了一片又一片。忽然绳子断了，他一下扑到稀泥里，搞得面目皆非，像个泥猴儿。爬起来后，到临近的水渠里洗了洗，又去当纤夫。

田宝齐有恐水症，看见水里的倒影就头晕，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后来领导叫他去旱地干活。

我的任务是在田里除杂草。经常有马蜂蜇我的脸，我用手拍打马蜂，弄得满脸是泥，成了戏台上的大花脸。有一天叫我看水牛，我拄着木棍走在田埂上，好像踩着鳝鱼背，随时会滑到稻田里。走了三里多路，看见水牛卧在池塘里睡大觉，我想何必派人看着呢？后来我明白了，不是怕水牛溜走，而是怕“外星人”来偷水牛，许多印着“新北大”的麻袋不是不见了嘛！

九连召开大会，一位工人师傅作“报告”。他说：“你们是第一代鲤鱼洲人，也就是鲤鱼洲的老祖宗，以后子子孙孙在这里开荒种地，通过你们的双手，把荒芜的鲤鱼洲变成万亩良田，亩产千斤两千斤……让全世界羡慕吧！”

位工人师傅说的这番话，为我们描绘的“远大前程”着实把一位农民家庭出身的教师吓坏了，“让全世界羡慕吧，反正我不羡慕，我不羡慕！”这位教师怕做鲤鱼洲的老祖宗，一狠心辞职回乡了。他当然对农村情况很了解，要当农民不如回自己老家，可不能做鲤鱼洲的老祖宗。

九连伙房门前常有农民来卖鱼：鲤鱼、鳊鱼二斤以下二角一斤，二斤以上的三角一斤。可工宣队有话，为割掉农民的资产阶级尾巴，不准干校人员买农民的鱼。没有鱼和肉不要紧，没有菜怎么行？鲤鱼洲连能吃的野菜都不长，只好派人到远处去买农民的菜，也不提割尾巴了。回来时鄱阳湖刮起大风，波滚滚而来，小船摇摇晃晃，不一会就翻了，船上的七个人全都掉入水中。五个人淹死，两人生还。大家含着眼泪把这七个人称赞为“七勇士”。生还者一个是俄语系的王荣宅，一个是后勤的刘月清。

干校总是事后诸葛亮，死了好几个人才想到自己种菜吃。俄语系的资料员郭雅存被分配去种菜。种菜需要水和肥，水就近可取，又派一位女教师和一位男教师到茅厕去掏粪。有一天派我和另外三位老教授挑粪，并以茅厕为背景拍照，然后让我们排成一队走在田埂上。照片拍好以后，说是准备送到北京去展览，说明：“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

后来有人问我：“龚先生，你挑得动吗？”  
我如实回答说：“桶是空的。”

郭雅存精心侍弄，重点培养，最大的冬瓜重80斤。干校有菜吃了，但为了进一步改善伙食，还要养猪捕鱼。猪长得慢，远水解不了近渴，捕鱼是个好办法。于是干校高价买了两条打鱼船，取名“新北大1号”和“新北大2号”，又买了两张渔网。后勤派出四位能手，在鄱阳湖和堤内一条长河上撒网捕鱼。雨多水深，鱼不上网，几个月过去了，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两条船派不上用场，停在岸边任凭风吹雨打。

内湖湖边上用木板做了一个平台，台上搭个凉棚，里面装着一个大口径的水泵，平台后面有一个用水泥砌的长方形水池子，池子下面是大片稻田。干校派我在这里管水泵，每隔四十分钟放一次水，抽上来的水通过水池流向稻田。稻田里有鳊鱼、鲢鱼、鲫鱼、鲤鱼……鳊鱼和鲢鱼呆头呆脑睡大觉，惟有鲤鱼、鲫鱼天性活泼，总是顶水上游，甚至跃入水池。水泵

停放之后，水池里总会留下几十条，我用抄网挑大的捞上十几条鱼，放到脸盆里，带回去送给老农师傅。他把鱼收拾好，抹点盐，晒成鱼干，带回家去。

考古系的宿白教授，负责引水灌溉。一天下午，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脑涨，只好到我这里来乘乘凉。他喝了一大杯水，坐下来谈：

“把我们下放鲤鱼洲，说是劳动锻炼，其实是惩罚。等他们想明白了，还得让我们回去。听说我们系里有些化石被孩子们偷走了，不知三叶虫丢了没有？”

我说：“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安心劳动吧！当年沙皇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奶娘给他讲了许多民间故事，这些朴实的故事经过普希金的加工改写，成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受到俄罗斯人的喜爱。”

宿白对我讲的这些未置可否，只是大口大口地喝水。我接着说：“这里可没人给我讲动听的 stories 了，不过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学会农活也好嘛！我想学校还是要办的，工农兵学员也得有人教吧。有朝一日放我们回去，我也不想教书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四五年，四五年一次，每次‘臭老九’都是革命的靶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过不了关。所以我打算改业，到农场去，通过俄语学好米丘林的园艺技术……”

宿白取笑我道：“那以后我们就有苹果吃了。”

1970年秋天，连日大雨，鄱阳湖水位不断上涨，大堤西南角一段比较低，洪水可能漫过大堤。干校指挥部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命令：“大堤出现决口的险情，全体战士就地待命，准备上大堤！”

我年纪较大，领导让在宿舍留守。俄语系一位女教师送来四个五六岁的孩子，并嘱咐我如果洪水冲过来，赶紧把孩子送上大堤。她走后，我想如果大水冲来，我背着一个，抱着一个，还剩两个，怎么办呢？心中十分焦急。猛然间想出一个办法，我急忙跑到屋里，搬出四张竹榻来，把竹榻脚朝上放在地上用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再用绳子把床腿拦上，作扶手。一个男孩给我递绳子，女孩们在一旁看热闹。做好之后，一个男孩说：

“嘿，真像一条方船。”

我说：“大的叫船，小的叫舟，也可以叫‘方舟’。”

天真的孩子们嘻嘻哈哈站上去，说：“大水快来呀！我们坐‘方舟’上大堤，多好玩呀！”

我这个临时保育员又给他们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很高兴。

鄱阳湖逐渐退潮，水位下降，一场惊险过去了。几位母亲从我这里把孩子接走，送回幼儿园，她们回到田里去干活。

“双抢”（抢收抢种）之后，干校精选了一千斤大米，派专人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献礼，说明劳动思想双丰收。粗略估算，大米每斤要五元钱的成本。当时盛行“只要思想棒，不算经济账”。

俄语系让我和桑枫回北京休假探亲。我们先乘火车到南京，领教了“火炉”的厉害。下午五点多钟换车回北京。我到家一看，燕东园沉寂无声，左邻右居都下干校去鲤鱼洲了。自我走后，妻子和六岁的小孙女住在一栋空楼里，担惊受怕度日子。那时北大在燕东园构筑防空洞，几十个工人日夜赶工，我家前厅被隔离开来，住进两位监工，安上电话，妻子和小孙女这才安下心来。白天小孙女到院里看热闹，晚上听奶奶给孙女讲故事。

我回家后，有一天早晨，忽然接到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儿子猎夫的电话：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今天我买东西……”

我打断他的话，问道：“你到哪儿去？”

他回答说：“见面再说吧。”

见面之后，才知道外交部派他到贝尔格莱德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这当然是一件大喜事，特别是在极度混乱、人人朝不保夕的年代。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地为猎夫送行，所谓“全家”实际上已支离破碎：二儿子去了陕西，三儿子在京西木城涧煤矿当矿工，最小的四儿子十六岁就去了北大荒。动荡年代，总要制造无数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家庭总是和动荡的年代相生相伴。

猎夫走后，我也准备回干校。我去干校之前体重150斤，这次回来一称，降到了135斤。妻子看我瘦成这样子，不禁流下几滴眼泪来。她背着我到王府井大街北头路西一家收购店，把我在景德镇买的彩绘无量佛瓷瓶，以十元废品的价格卖掉了，买了两斤油炒面，让我带回干校去加点营养。这个瓷瓶是我的心爱之物，卖掉它十分可惜，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不过妻子的一片爱心又实在让我感动。油炒面我只带了一斤，给妻子和小孙女留下一斤。

我回干校第二天，正赶上干校开展览会。什么展览会？来到会场一看，只见一块平地上放着两张长桌，上面摆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对面的高坡上站着二十多位收件人，男的穿着短裤、背心，女的穿着短裤、汗衫。与其说是食品展览，不如说是“模特”亮相。主持大会的工人师傅大声呵斥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劳动改造期间还不肯吃苦，让家里人从北京寄吃的，寄营养品，又怎么改造思想，做人民教师？……”

这个展览给我上了一课，心里想着那带来的一斤油炒面，是倒进湖里喂鱼呢，还是撒到田里施肥？左思右想，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每次吃饭时舀出几勺油炒面，放在搪瓷杯子里，再用稀饭盖起来，躲在一旁狼吞虎咽吃下去。我赶紧给家里写信，千万别寄吃的东西，免得下次展览会上当模特。

我在鲤鱼洲干校劳动期间，轻活重活都干过。穿上雨衣，戴上斗笠，在雨中抬石头铺路，卸船扛化肥，走在跳板上颤颤巍巍，一不小心就会掉在三四米深的鄱阳湖里。两位女教师拦住我，不让我扛，但我还是扛着五十斤重的一袋化肥送到厂房里。

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跟老师傅学习育苗、插秧、割稻，虽然不够熟练，总算学会了一些基本技能。育苗是关键，首先得把秧畦里的土筛成细面，把选好的稻种撒在秧畦里，每天用喷壶洒水，几天之后稻苗露出头来，长到五六寸，放水入畦，长到一尺多高，拔出来捆成小捆。这时大片稻田已经准备好，用细绳拉上两条直线，线距约五尺，放水入畦，水深七八寸。在两线之间插秧，从小捆稻秧里，抓出几十株稻苗，从左向右插六墩，一直插到右线。退后一步从右向左，依次插到左线，照此程序一直插到稻田尽头。插好一墩之后，要把周围的泥土按实，不然稻秧就会浮在水面。

割稻时要把田里的水放出，稻田晒干之后，开始割稻。割稻也有讲究，首先要把镰刀磨快，割起来才省劲。我是这样割稻的：把刀锋避开自己的小腿，一刀一刀割下去，割下来的稻子放在一旁，前进一步，继续割下去。有的教师不会割，把自己的小腿割了一刀，鲜血外流。轻者到干校医疗所擦点药，几天就好了，还可以去干活；重者要瘸着腿走路，在众目睽睽下出洋相。我认为做什么事都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就会酿成灾祸。

1970年12月，我随着第一批教师回到北京。叫我回系里教课。这时我想，我在鲤鱼洲劳动了一年（包括在井冈山十五天），有得有失，但就我的专业来说却是得不偿失。

□ 摘自《乐观人生》，龚人放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

~~~~~

## 【劫后反思】

今天该如何反思文革？

• 马 勇 •

一，缺乏有效制约是文革起源

凤凰评论：在今天看来，十年浩劫在社会各个维度仍很有值得警醒之处。怎么看待当年文革起因？

马勇：社会需要理性思维、多元声音，只存有右派或左派声音都不对。中国当年有文革，就是因为思想太一元化。

真正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是不需要听谁讲该如何的，而是让多元声音来自己领悟。多元意味着要容忍异己说话，容忍甚至现在很极端的声音。如果没有多元的声音，反而会让更多人沿着一条道儿去想。

如果回头体会文革之所以发生，之所以那样疯狂，主要的是因为不再有异议，不再有不同声音。或不敢，或不能，党内经长时期规训，相信一个领袖，走上了盲从。党外有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一系列教训，异样思考能力严重退化，原本应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人也渐渐失去了思想能力。

凤凰评论：你研究近现代史，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晚清时期的清廷与建国后文革前的中国其实都具有杨小凯常说的后发国家优势，可以“拿来”，在别人已有成就上直接发展。怎么看待后发优势没被充分利用的原因？

马勇：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充满偶然性，跌宕起伏，最富戏剧性。回望一百多年历史，进步巨大，但是没有一次进步顺利无碍，几乎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势是：事不过三，几乎所有大事，类似、相似的事情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悲剧，第二次喜剧或闹剧，然后前进一大步。近代中国几乎一直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很多研究者比较过十九世纪晚期洋务运动与二十世纪晚期改革开放的得失，也试图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两次运动都是被迫的“后发型”现代化，也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先发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直接购入或引进别人已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不用从零开始。

洋务运动也称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从1860年—1867年，才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就能够仿制西方战舰、枪炮等等。也是等到1870年之后，中国的傲气出现了，慢慢出现了一个口号叫“中体西用”。我们也必须承认那时的中国有傲气的理由，毕竟“我大清”不改革体制也是可以的，甚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资源、市场，发展较同时期的

日本还要快些。这是洋务领袖没有在经济增长之后推进体制改革的原因，后来公平去看也有其道理。

凤凰评论：问题出在哪？

马勇：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没人看见，但是如果把看到的人的声音都屏蔽掉、压制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自然就听不到反馈问题的声音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现了那么多的党内纷争——我们过去叫做路线斗争，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这意味着反对毛泽东的思潮、势力一直有，只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下来，使这些党内的反对声音被屏蔽，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许多错误得以发生的根源。

造成这种状态，和1949年之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那时毕竟处在战争年代，参谋人员的建议是必要的，而指挥员的决断显得更重要。那时，中共党内需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敢决策，能决策，善决策，而且事实上，由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共产国际关系都发生变化，使毛泽东在这几年当中在战场上打得很顺，实事求是说，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想到四年后国民党丢掉大陆，毛泽东、共产党得天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至少在1956之前，毛泽东真的像神一样。

## 二，把文革研究还给历史学者

凤凰评论：之前曾有声音称“一些超越回忆与纪念的东西试图在舆论场上扩音”，认为在继续总结文革教训时别有用心是不行的，你怎么看？

马勇：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对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态历史阶段，我们都有反省的责任，要像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永远反省，永不过分。何况历史也不是一次结束，你不反省，它就会再出现。

我认为这种调子是对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无论怎样反省，都不该说反省者“别有用心”，错误就是错误，罪恶就是罪恶，反省就是要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以别有用心指责反省，仅仅站到了道义上的至高点。我并不怀疑叶剑英讲的两千万人直接受难，两千万人所牵扯的家庭是多大的家庭，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当中，受磨难的应该是占人口的一半以上，对这种惨剧不反省肯定是不对的。

当然我还赞成另外一个主张，对文革这种重大事件，不仅应该反省，而且应该走向另外一个常态，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把历史还给历史学家。历史不应该在政治家手里面去操弄，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才能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一直被绑定在政治话语当中，政治也说不清楚，学术也说不清楚。这是近代以来许多重大事件无法获取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只能交给专业研究者去研究去讨论。

凤凰评论：对于那十年，现在的多数人是忘记不得，又记不起来，如何规避过度掩盖的副作用？

马勇：历史越遮蔽，遗留的问题就越大；遮蔽的时间越长，留给后世的困难就越大。文革发生已经五十年了，在刚宣布结束的时候，因为需要凝聚共识向前走，因而中央作了一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决议，暂时平息了争论。但是后来这段历史几乎成了禁区，研究不得，说不得。

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对这十年不太了解了，比如那些赞美文革的言论，其实就没有弄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遮蔽历史，必然会带来历史的困扰。抽象的否定，而没有事实予以佐证，也很难让人信服。

历史是具体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因果关联，没有事实，不能就事论事，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意义，都是徒添烦恼。今年应该趁着文革开始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好好释放一下研究空间。一个多元的中国不是可怕的中国，害怕多元的中国才是最可怕的。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真实的历史，如果能亡人国家，灭人社稷，那就不会有革命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不让研究，历史并不会完全消失，不论过了多少年，这些历史事实都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凤凰评论：在当下，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人对文革怀有浪漫想象？

马勇：今天讲民主，不能走文革，也就是不能走红卫兵那种大民主，这是应建立的共识，民主有边界、有规则，要有节制地推动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和执政党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仍然是我们的追求，这样才能去检讨。

我之所以认为放开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就事论事，从历史事实上分清每一件事的发生、发展、结局，及其相关责任，而不是笼而统之让哪一个人承担抽象的历史责任。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值得整个民族集体反省，分清责任只是弄清真相，并不是鼓励报复，记住仇恨，相反，弄清真相，分清责任后，就应该记住教训，全民和解，丢掉历史包袱。

□ 来源：微信号《故问社》

~~~~~

## 【不堪回首】

### 魂萦上海滩——文革中的那些邻居

· 木 桩 ·

写着写着，就进入文革了。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搬进了上海靠近郊外的新村房，那里本来是一片农地，六十年代，政府在那片农地上建造了一大群五层楼的新村楼房，住户很杂，大部分是工人，职员，教师，劳动模范，机关干部，也有些各行各业的名人：电影演员达式常，漫画家乐小英，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还有电影导演谢晋也住在那里。新村区有两栋楼和其他楼不同，那是用外汇购买的，住着一批印尼归国华桥，也有外汇支持的家属，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隔壁邻居是个孤独的老太太，大户人家出身，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做过国民党的什么妇女官，似乎是个蛮大的头衔，实在徒有虚名。想必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锋芒毕露，爱出风头，喜欢抛头露面，谁能料到以后的事呢？49年后，她被送进了监狱，判了无期徒刑。据说在监狱里，老太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思想改造得很好，减刑为20年。老太太感激不尽，越加起劲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大谈心得体会，所以提前释放了，定为历史反革命。老太太出狱后住在北京女儿家，本该含饴弄孙，益寿延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岂知那位共产党员女婿，一介七品芝麻官，狗眼看人低，冷言冷语，话里带刺，好像占了他便宜似的，老太太哪能听不出来？苦于寄人篱下，只得忍声吞气，女儿则敢怒不敢言。老太太也是

有骨气的，不受这样的窝囊气，一赌气，来了上海。老太太有个儿子在加拿大，是化学工程师，给母亲买了新村的一套房子，从此，我们成了好邻居。

晚上，听到轻轻的扣门声，老太太来了，一脸笑容可掬，她是来拿“参考消息”的，我家里有从伯父家中拿来的“参考消息”，老太太很喜欢看。有一天，被楼上那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小赤佬撞见，说老太太是历史反革命，被管制的人，不能看“参考消息”。小赤佬去居委会告发，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下把老太太吓破了苦胆，再也不敢来拿“参考消息”了。我灵机一动，充当了传递员，把“参考消息”藏在怀里，衣服盖好，趁黑夜偷偷地溜过去，轻轻扣门三下，这是暗号，老太太赶紧开门，探出头来，左右张望，接过“参考消息”，赶紧关门，拉紧窗帘，拧小电灯泡的亮度，像从事地下活动似的。

楼下住的是三姐妹，高中考不上，工厂又不肯去，高不来，底不求，赖在家里做社会青年。她们的父母离异，母亲去了法国，给三个女儿买了新村的一套房。这三姐妹个个如花似玉，细皮白肉，娇里娇气，嗲声嗲气，烫着头发，穿着国外寄来的布吉拉，小脚裤子，尖头皮鞋，街坊邻居？批评她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也难怪，那年头，革命宣传画中的人物，个个是胳膊粗壮的工农兵，一只拳头紧握在胸，另一只手臂高高举起，一脸的愤怒，穿的服装不是一身蓝就是一身绿，这才是最流行的风尚。

电影导演谢晋住在隔壁一栋楼的四楼，他有四个子女。长女是弱智，看上去些许迟钝，倒也无别样。第二个是男孩，谢天谢地，是个聪明的孩子，高大英俊，不仅没有半点的痴呆，而且遗传了父亲的智慧，继承了父亲的行业，在一个文工团里工作。第三个和第四个都是男孩，一个叫阿三，一个叫阿四，这是两个智障孩子。这俩兄弟长得非常像，双胞胎似的，外人很难分清谁是阿三谁是阿四。谢家雇了一个家庭教师，是个中年妇女，从教会来的，戴付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邻居七姑八婆，背后指指戳戳，说她很坏，我看不出她有任何坏的地方，为何要去损她？心里有些许愤愤不平。有时候在弄堂里，可以看到家庭教师带着阿三阿四，一前一后，阿三阿四斜着眼睛，歪着嘴巴，流着口水，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有些不道德的野蛮小鬼，在弄堂口候着，见阿三阿四走过来了，便在后面扔石头，叫阿三阿四吃泥土，吃蚯蚓……

谢晋的父亲当年胸前挂着牌子，写着“土豪劣绅”四字。他高大，挺拔，儒雅，庞眉白发，拄着一根拐杖，俨然一付绅士派，悲惨的是，他在文革中服毒自杀了。谢晋的母亲平时深居简出，偶尔见到她，也是神态麻木，气色阴沉，不与人搭理，但是脸上那些精致的轮廓残余犹在，总也遮不住曾经的美人胚子。那天，她是从四楼的阳台上坠落下去而死亡的，怎么会坠落下去的呢？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自杀，也有的说是被阿三阿四推下去的，听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邻居说，人掉在地上了，阿三阿四在四楼阳台上拍手叫好，还叫大家快来看！竟然有人编派这种耸人听闻的故事，我不相信。我亲眼看到老太太面朝下，伏在地上，身上盖了一块白布，我不敢走近看，只是远远地撇了一眼，赶紧逃回家。那天晚上，脑子里不断浮现出白天见到的一幕景象，挥之不去，非常难受，晚饭也吃不下，想呕吐，结果发高烧了。

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他的父母，一个服毒，一个坠楼。谢晋急急赶回家收拾惨局。楼前围着看热闹的群众，我也挤在里面。谢晋脸色惨白，面无表情，没有哭泣，没有眼泪，没有语言。他急速办完事，随着殡车匆匆离开。人群里没有人讲话，而用眼泪凝视，用手帕都感到多余了。大家目送殡车远去，默默散开，拖着缓慢的脚步离去。那幕景象，不能不触动我，不能不触动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悲痛欲绝的人，他的悲痛却不敢表示出来，表示出来意味着更大的灾难，这是一个痛心的逻辑。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那么文革的浩劫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灵魂。

每逢年过节，父亲，隔壁的历史反革命老太太，15号里的漫画家乐小英，谢晋的父亲（自杀前），前楼那个“反动学术权威”，后楼那个“国民党特务”……反正都有名堂的，统统归在“牛鬼蛇神”的队列中。这些白发苍苍，儒雅斯文的老人，拄着拐杖，巍巍颠颠地去居委会集合报到，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弯着腰，保持九十度姿势，洗耳恭听。那个马列大妈，不识得几个字，苦大仇深，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大声训斥，严肃警告：不许乱说乱动，不许搞破坏活动。

我问父亲：爸爸，你们为什么要搞破坏活动？

父亲回答：我们老了，搞不动破坏了，搞破坏的是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

只要略有文明记忆的上海老一辈，一定记得，他们那一代的绅士精神，贵族文化，曾经被歌颂，被崇尚，被模仿，成为传统，成为遗传。可悲的是，文革时要从细微末节开始彻底铲除，从文明的一切精雅部位开始疯狂扫荡，用一种明知低劣的文化取而代之。我是在旧文化和新时代的交溶中，圣洁和邪恶的厮杀中，高尚和低劣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用我一生的经历去认识这个世界，在崎岖艰难的道路上挖掘真金，在风雨迷茫中寻找真理。

如今的上海滩，往日的恩恩怨怨，曾经的磨难浩劫，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曾经留在人们脸上的那种悲哀，那种担心，那种恐惧。上海滩比任何年代都繁华热闹，欣欣向荣。人们喜气洋洋，出国风，买房卖房风，股票风，大妈炒黄金风，贪官炒小三风，学者炒造假风，孩子炒拼爹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我们以前追求的已经大相径庭了，我们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了，非常功利了，非常市侩了，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健忘了？

让实实在在的事实有一次说话的机会，梦呓，痴心，期待，都已随风飘去，此地，挖个小坑，把故事埋葬。

□ 来源：《倍可亲中文网》<https://www.backchina.com>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